



—世界著名经济学家 展望21世纪的经济学

王秋石
李胜兰
徐明棋 等译
苏晨汀 校

江·西·人·民·出·版·社

目 录

译者的话	(1)
原编者按	(3)
代序言:未来 100 年的经济学	
.....(英)《经济学家》编辑部评论员(4)	
○走向一种更新的经济学:未来就在前面	
..... 威廉·鲍莫尔(13)	
○超越人们思想极限的经济学	
..... 杰格迪什·伯格沃蒂(24)	
○后社会主义世纪中的经济学	
..... 詹姆斯·M·布坎南(34)	
○营养、非凸性和再分配政策	
..... 帕撒·S·达斯格普塔(45)	
○未来 100 年决策理论的展望	
..... 彼特·C·菲什伯恩(53)	
○新瓶装旧酒	
..... 米尔顿·弗里德曼(61)	
○下个世纪的经济学	
..... 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73)	

- 未来的 100 年 弗兰克·哈恩(81)
- 经济计量学的回顾与展望 杰克·约翰斯顿(89)
- 经济学和企业 约翰·A·凯(98)
- 下一个 50 年 埃德蒙·马林沃德(109)
- 21 世纪的一般均衡理论 森岛道雄(118)
- 进步和微观经济数据 安德鲁·J·奥斯卡尔德(128)
- 经济学发展前景的展望 约翰·潘卡维尔(135)
- 2090 年的经济学:一个试验主义者的观点 查尔斯·R·普洛特(146)
- 下个世纪的经济学 奥斯汀·罗宾逊(156)
- 实验经济学的分支——对策理论 阿尔文·E·罗思(175)
- 经济学的连续性和变革 理查德·施马伦西(185)
- 增长的决定因素 尼古拉斯·斯特恩(196)

○另一个世纪的经济科学

..... 约瑟夫·G·施蒂格列茨(213)

○下个100年

..... 斯蒂芬·J·图尔诺夫斯基(224)

○黑箱

..... 杰克·怀斯曼(235)

译者的话

1990 年是英国皇家经济协会成立 100 周年纪念,由该协会主办的《经济学杂志》也走过了 100 周年的历程。为了隆重纪念这一节日,该刊现任主编海伊邀请部分世界著名经济学家以“下一个 100 年”为题撰写专稿,并将所收到的 22 篇论文汇编成集,在 101 卷第一期(1991 年 1 月号)作为专刊发表。

这 22 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围绕着各自的研究领域,回顾了经济学过去 100 年的历史,展望了未来 100 年经济学的发展趋势。这些论文对我国经济学界及时了解西方经济理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幸蒙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李建德副研究员以学者般的博识鼎力推荐,才使得这本书能与国内读者见面。借此机会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参加本书翻译的同志基本上都是归国留学生或国内硕士研究生。具体分工如下:王秋石翻译了原编者按、贺信、代序、各位经济学家简介、第 1、2、10、12、15、20 篇论文;李胜兰翻译了第 4、7、8、11、13 篇论文;徐明棋翻译了第 6、14、16、18、21 篇论文,严武翻译了第 5、17 篇论文;徐洪翻译了第 9、19 篇论文;朱刚翻译了第 3、22 篇论文。所有的译文初稿均在参译者中交叉校译,最后由王秋石负责全书的总纂。由于我们翻译水

平有限，加上原文内容博大精深、语言晦涩难懂，尽管译者作
了很大努力，但不妥甚至错误之处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王秋石

1991年7月9日于江西财院

原编者按

本期《经济学杂志》是本刊第二个 100 年的第一期，也是首次 6 期一卷的第一期。因此，以适当的方式来纪念这件事，看来是恰如其份的。

百年纪念的大部分活动，都是致力于回顾本协会及本刊过去的百年历程。因此，为了纪念第二个 100 年的开始，展望未来 100 年是合适的。几个月以前，我写信给一部分曾经在本刊发表过大作的杰出经济学家，邀请他们以“下一个 100 年”为题惠赐佳作。一些人以经济学家过去并不特别擅长于预测为由，婉言谢绝了；一些人接受了邀请但没有寄稿；其它的人既接受了邀请，又寄来了稿件，本期便是其结果。

尽管本期有那么一点良莠相间，但从整体上讲，它将是富于情趣和启迪性的。一些作者重新论及人们熟悉的领域，有的人则抓住这一机会作了非常大胆的预言——因为无论他们的预言是否为真，百年之后他们都将不复存在了。大多数作者描绘未来的想象力是有建设性的。如果他们的预言变成现实的话，那么，未来 100 年对经济学家和经济学来说将是激动人心和硕果累累的 100 年。我们将拭目以待。

J. D. 海伊

《经济学杂志》主编

代序言

□未来 100 年的经济学□

(英)《经济学家》编辑部评论员

通过展望下个世纪的经济研究,本文对我社出版的“经济学现代经典系列丛书”作一概述。尽管经济学面临许多批评,但到 2091 年,公认的经济学形式将依然存在。然而,它的目标和方法势必发生变化。

如果科幻小说作者们曾经想到过经济学的话,那么他们也只是把经济学想象成为目前不可缺少的一种不幸。在他们

* 该系列丛书已由英国经济学家报纸有限公司出版,介绍了 12 大经济学派。

所想象的未来中，货物和劳务生产与交换的现有制度安排通常业已消灭了，——或许是因为资本主义遭受环境的或其它的大灾难，以至于使世界回归到混乱的黑暗年代，或许是因为人类所获得的物资是如此丰富，以至于再也没有必要去做什么经济选择了。这些观点虽然很诱人，但实际上却不可能。稀缺性以及作为其处置手段的经济关系很可能是人类生活不可逃避的现实。

无论人们喜欢与否，经济学家仍将存在。世界需要什么类型的经济学家，以及能够得到什么类型的经济学家更加难以预料。英国皇家经济学会刚刚出版发行了《经济学杂志》百年专号。为了纪念这一时刻，该刊主编约翰·海伊邀请该刊最为杰出的撰稿人展望经济学的下一个100年，任何发现那套系列丛书有趣的人都可能全文阅读这些文章并受益匪浅。然而，时间是稀缺的，所以，本文所介绍的思想取材于那本百年专号以及其他资料。

外界的探视

非经济学人士一致批评经济学家有二点不足：一是缺乏“贴切性”，二是对任何问题都不能达成共识。这一判断成立吗？如果成立的话，经济学不是将要枯萎和死亡了吗？

首先考虑**不贴切的指责**。毫无疑问，经济学正日益成为一个孤立的部落。正如弗里德曼所指出的那样，早年的《经济学杂志》“介于严格的专业性学术刊物和包含专业内容的大众期刊这两者之间，它所吸引的读者就像今天的《经济学家》杂志一样”。而今天的《经济学杂志》只限于极少数的专业读者，他

们中几乎没有什么人能够指望读懂其中的每篇文章。

工商界人士对经济预测仍抱有热切的期望(这也许是经济学家所生产最没有用的产品),然而这一点似乎正在消逝。在美国目前的经济衰退中,公司的经济学家们遭受惨重打击。经济学家和非经济学人士一样,对大规模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的预测越来越不屑一顾。同时,许多理论家所从事的研究既没有读者,又不能在其圈外得到任何可以想象的运用。

然而,从内部看,这种经济学退化的描述是不够确切的。由于经济学日趋复杂,对外行必然会显得更加令人生畏。作为一门发展中的社会科学,经济学将需要一支更为专业化的技术人才和理论家大军。问题在于,经济学家的研究能否向政策设计者以及其它专家提供充足的食粮。有朝一日,定会实现这一目标的。

这便剩下持久争议的指责。与自然科学不同,经济学似乎不能就其所考虑的过程与趋势得到一个更为完整的、更为正确的解说。相反,它显得毫无目的地从一个争论转向另一个争论,什么问题都未曾解决。

但是,这一看法又错了。经济学所研究的是人类行为,人类行为是不稳定的,而物理事件却是稳定的。正如罗宾逊勋爵所言:“16世纪欧洲的基督教改革运动并未对地心引力产生影响,但它的确改变了人们在星期五对鱼的需求量。”尽管如此,经济学仍然在进步,意见分歧的领域将会缩小,而看法一致的领域将会扩大。

如果这一趋势不甚明显的话,部分原因是由于非经济学人士对宏观经济学(它依然相对薄弱)比对微观经济学(谈论它时更有信心)更有兴趣;这还因为不少经济学家或者是糟糕

的传播者，或者是捣蛋鬼，甚至两者兼而有之。他们在公开的辩论中，不体面地自己降低自己的标准（在美国大学中，许多经济学家将那些为大众消费所写的文章通常看作是“劣等货”）。大量非经济问题的分歧也被轻率地与更狭隘的经济学问题混为一谈。外行除了看到混乱之外，别的什么也看不到。

事实上，观点一致的领域现在就很广泛。正如丛书第一本所解释的那样，当前的宏观经济学游荡于范例之间。50年代和60年代的新古典综合学派已经瓦解并被取代，而理性预期的思想（至少作为一个操作性的假设）不再存在纷乱的争议；理性和其它预期的重要作用，被广为接受。所剩下的分歧促进了新凯恩斯主义者们的研究，他们提出可能存在着的一种新范例，它将解释“市场失败”，而不仅仅是宣称“市场失败”的存在。这便是进步。

外生冲击

同以往一样，经济学设法回答的问题要受到历史的影响。最近，世界目睹了东欧集团的解体。在《经济学杂志》百年专号中，乔治·梅森大学的詹姆斯·M·布坎南指出，20世纪最大的一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已经结束，这会使经济学从此以后更富有成果。他期望在后社会主义世纪，少一点偏激的争论，而恢复规范性的讨论。这就是说，少坚持“偏见”，多一点建议的愿望。

哥伦比亚大学的杰格迪什·伯格沃德指出，全球经济正在日益一体化。20年以前，学生们（特别是在美国）都是用那些假定经济是封闭的模型来培养的；现在这种思路正逐渐被

放弃。在国际之间的货物、资本和(日益增加的)劳务流动将成为经济研究的前沿与核心。

第三次历史趋势对资源和环境不断地产生压力,这一趋势的重要意义更加难以判断。经济学以前在这些领域有所涉足——证据为马尔萨斯和罗马俱乐部(它在70年代预言世界经济将随着能源和其它资源的枯竭而崩溃)。技术的进步,特别是价格机制产生的市场力量粉碎了,过去这样一些有关世界末日的预言。当然,稀缺资源变得更加昂贵了,这势必迫使人们储备资源。

那么,当前的焦虑会消失吗?法兰西学院的爱德蒙德·马利沃德认为不会如此。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怀疑增长能否持续下去,并注意到了主流学派经济学家,如耶鲁大学的威廉姆·诺德豪斯,正将其注意力转向环境经济学。

需求方面

如果经济学是一个自身受约束于经济力量的市场,那么像东欧集团的解体、全球一体化、环境恶化等事件和趋势都是“外生”因素。内生的市场力量是什么呢?自然,经济学的这种市场也有需求的一面和供给的一面。在需求这一面,现代经济学还存在一些显著的和令人窘迫的空白。巨大的荣耀正等待着那些能够填补这些空白的经济学家们。

伦敦工商学院的约翰·A·凯强调指出,最大的空白就是厂商理论。微观经济学对厂商群体(即产生)有较多的理解。但是单个企业依然是个谜。就主流经济学而言,罗纳德·科斯的论文《企业的性质》仍然是现代最为杰出的作品,但它写于

1937 年。

“公司战略”一直处于这一旷广的空间。凯先生写道：“它的工具充其量是贫乏的，许多被视作公司战略的东西只不过是陈腐和教条似的告诫。”因而这为经济学提供了再度开拓研究领域的机会，这一领域早就应成为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了。凯先生称赞了伯克利加州大学的奥利弗·威廉姆森，这是因为他就单个厂商所面临的选择从事了“孤军奋战”似的研究。他的研究考虑了有关契约、产权、信息和交易成本等方面的经济理论，旨在解释厂商为什么是这样和为什么这样做。这类文献肯定会不断增多。

第二大空白便是增长理论。自从罗伯特·索洛及其同事们在 50 年代和 60 年代早期从事了开创性研究之后，这一经济学的分枝沉默达 20 年之久。理论家们无力解释一个人口稳定的经济在长期内为什么能够增长。在这些模型中，技术进步以及关键性问题成为一个难以对付的分子：一个不受经济力量影响的外生因素。宏观经济学研究的焦点集中在如何将实际的产出提高到与其目前潜在的产出水平（这连续不断地成为挫败宏观经济学家的一大任务）——而不是在长期内如何同时提高潜在的和实际的产出。

近来，对于增长理论的兴趣开始被重新唤起。在芝加哥大学的保尔·罗麦和罗伯特·卢卡斯的率领下，经济学家们正在开发一些给予技术进步应有重视的、令人信服的理论。纵览这一新文献之后，伦敦经济学院的尼科拉斯·斯特恩总结道：“我们尚未取得长足的进展”，但是，至少“一些正确的问题被提出来了。”

正如牛津大学的弗兰克·哈恩所注意到的那样，第三大

空白也许就是最为深远的，填补它将会极大地改变经济学的特征。许多理论家对于理性这一概念日益不满，而它却是经济学的基石。经济主体明显地不总是有理性地去行为，至少在一概念的更为严格的定义上说是如此；然而，同样明显的是，人们的行为，在较为宽松的意义上说，是井然有序和符合道理的。许多像伯克利加州大学的乔治·阿克洛夫那样的经济学家们开始对“近似理性”的含义进行探讨。为此，他们还研究了社会学、人类学乃至心理学等领域。

经济学是一门行为科学，但这一领域里的研究课题长期被延误了。虽然阿克洛夫及其追随者的研究已经产生了令人注目的新见解，但也仅仅是涉及其表面。更好地理解经济事件的价格——如果这是一个价格的话，这些研究将使得经济学更加温和、更具经验性和试验性，因此，更少一些理论性和分析性。

供给方面

经济学特征的这些变化会随着供给方面的发展而强化。正如许多产业一样，经济学是被其生产者的兴趣所驱动的。通常，经济家提出新的分析技术，然后去寻找与其相应的研究课题。50年代和60年代数学和统计方法的发展，在随后的数十年间对构造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

未来一代的技术已见端倪。华盛顿大学的斯蒂芬·图尔诺夫斯基看到了非线性方法的光明前景。当前，经济理论家主要处理一些线性关系——在图表上表现为一条直线。这种限度实际上比看上去更有限：通过简单的处理，非线性关系通常

可以从数学上转化为线性关系。但是,如果你使用线性方程建立一个反映经济在不同时期的模型(称为动态模型),你就常常发现,这一模型要么在一点固定下去,要么在其它处发散。相反,世界趋向于循环式地周期波动,因此很容易用非线性关系将之再造出来。

非线性方程在其它方面也很有用处。它们捕捉住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微小的波动会产生惊人的效果——这便是构成模糊研究的基本观点。许多经济过程都呈现出模糊性。所以,这种新的数学研究思路会有利于经济学的发展。

许多年以来,经济学家们都表现了一种愿望,对策论将对经济学产生一场革命。对策论研究了价格谈判或“战略选择”:杰克的决策依赖于吉尔,吉尔的决策反过来又依赖于杰克。直到最近,这一理论在强调传统经济学的缺陷方面,比在提供其自身答案方面做得更为出色。但这种状况已经开始有所改变。麻省理工学院的吉恩·狄罗尔对工业经济半成品性质的研究成果,便是建立在对策论基础之上的;战略贸易理论也是如此。应用范围在日益扩大,对策论毕竟没有死亡。

由于计算机的运用,这些新的技术将与日益广泛和温和的经济学结伴成行。到目前为止,经济理论(与经济计量预测相对立)主要是借用了一些分析方法:通过挖掘脑力建立模型、求出其均衡值。非线性系统和对策论自身并不属于上述这种方法。要得到分析解,必须通过大量的数字运算才能解决(即使采用高级计算机,并非复杂的动态经济模型也要花费数天时间才能计算出来)。

计算机还可用于进行仿真和实验。例如,在对策论中,各种战略可以被写成计算机程序并在相互比较之后求得最佳战

略。

因此,在未来,经济学家们将是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紧密地与计算机捆绑在一起。尽管像过去一样,他们的目标主要还是改善他们的理论进而加深对现实世界的理解,但是,如果顺利的话,他们将不会生产出糟糕的预测,而糟糕的预测在过去是由于经济理论的脆弱和所提供的大量不准确的统计资料所造成的。

译自(英)《经济学家》1991年3月9日—15日刊,
第76—77页。

走向一种更新的经济学：未来就在前面

□威廉·鲍莫尔□

威廉·鲍莫尔（William Baumol），美国著名经济学家，1922年生于美国纽约州纽约市，1942年获纽约市立学院社会科学学士学位，1949年获伦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并于1965年、1971年、1973年分别获得赖德学院、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和诺克斯学院荣誉博士称号。曾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美国东部经济学会、环境资源经济学家学会、美国统计学会中部新泽西分会会长，1957—1958年任古根海姆纪念基金会会长，1965—1966年任福特基金会研究员，1970年兼伦敦经济学院荣誉研究员，1971年以来被普林斯顿大学和纽约大学联合任命为经